

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多模态话语分析

蔡 丹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1)

摘 要: 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是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 其作为动态多模态语篇, 可以从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方面来考察。语场方面, 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主要体现了“型符”主导的内容选择和概念化的语义关系; 语式方面, 解说模态相对于图像等模态处于主体地位; 语旨方面, 传播主体的意图与视角选择使内容具有扁平化倾向。

关键词: 少数民族; 节目; 多模态; 话语

中图分类号: J9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 (2015) 08-0086-04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inority Television Cultural Programs

CAI D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television cultural programs of minority are an important means of disseminating minority culture. As a dynamic multi-modal discourse, it can be examined from three aspects: language field, tenor and mode. In the aspect of language field, minority television cultural programs mainly reflects the legisign led content selec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semantic relations; in the aspect of tenor, explain modal is in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image and other modals; in the respect of tenor, the communication subject intention and the choice of perspective make the content flat-orientated.

Key words: minority, program, multi-modal, discourse

一、引言

电视节目是一种动态多模态语篇, 少数民族电视节目作为文化类节目中的一种, 也是综合运用了图像、文字、声音(同期声、解说、音乐)等形式多模态符号系统, 涉及到对不同模态或模态组合进行选择并生成连贯话语的概念化过程。如何利用好多模态表现手段, 遵循电视节目表意规律, 关系到节目的传播力以及少数民族形象建构的最终效果, 因此对少数民族文化节目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多模态指的是除了文字文本之外, 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 或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的复合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1] (P1)} 多模态性的研究旨在说明人们对不同符号特性的选择、掌握和运用, 以及对不同符号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2] 多模态话语分析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

学和社会符号学为基础。韩礼德认为语言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三大功能,^[3] 与其对应的就是“语场”、“语旨”和“语式”三要素, 三者是情景语境的反映。本文的论述也是围绕这个框架展开的。

综观现有各类研究少数民族电视节目的资料, 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从实务的角度探讨节目的风格、特色、传播现象、制作业务、发展策略等方面。很少涉及此类节目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及其符号表意研究。本文试分析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的多模态符号表意现状并提出建议, 以期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和电视媒体的对接, 为更好地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和建构民族文化品牌提供参考。

二、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语场的概念意义

“语场”指语言所要表达的话题内容, 可以理

收稿日期: 2015-06-14

[作者] 蔡丹 (1984-), 女 (侗族), 贵州万山人, 新闻学博士,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互联网管理、网络新闻。

解为语篇内容中发生的事，它影响语言符号的选择。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的“语场”有其自身的范围特点，常表达的话题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事物的话题，比如反映少数民族的服饰、饮食、物产、手工艺、医药、民居建筑、风景等等；另一类是表现人物活动的话题，比如歌舞活动、休闲娱乐、民间趣事、民俗风情、节庆祭祀、历史文化等。

这些选题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能够挖掘、保护、传承并宣传原生态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也能为当地留下第一手的民族文化视频资料。对于受众来说，这样的节目可以普及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传播异域风情，满足受众求新求异的好奇心。但是，这样的选题多了，并没有太多可持续发展力。首先，类型化、套路化的节目不能长期地吸引受众；其次，少数民族习俗的文化遗产性质使其选题总有枯竭的时候。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型符”主导的内容选择

通过观察央视的《乡土》、《走遍中国》等文化栏目以及一些省级卫视的少数民族文化节目发现，很多节目表现的是某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即使是选取某一或者一家人来进行叙事，也是采取以小见大的表达方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族群。因此构成节目内容的，多是“型符”，而不是“单符”。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在他符号的第一种分类中，就说明了“单符”和“型符”的区别。单符“是作为符号的一种实际存在物或者事件，只能根据它自身的品质而成为符号”；“型符是作为符号的一种法则，这种法则常常是由人确立起来的”，“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对象，而是一种一般的类型”^{[4] (P50)}。

节目常用的句式比如，“一个……的民族”、“……族对……充满了热情”、“每年的……，当地都会……”等，都是对于“型符”的表达。并且为了提高某一族群的辨识度，突出民族特色，节目往往选取某族群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作为内容。这样，一个人或者一家人成为一族人、一类人，这个族里的人没有太多不同。这虽然能很好地把每个民族区分开来，但也造成了少数民族形象建构的扁平化，不能反映丰富的百态人生。并且当“苗族人吃什么”、“侗族人用什么”这类的“型符”多了之后，受众可能难以记清这些区别，“特色”多了也就不是特色了。

为赋予节目更长久的生命力，应更多地在此“单符”内容上进行挖掘，这并不是否定“型符”的表意，各种内容表达都有其功能和作用，只是节目制作可以多融入“单符”元素以更好地丰富内容。少数民族地区和人物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唯有不同命运的个体与持续不断的变化能为节目提供源源不绝的素材。

（二）概念化的语义关系

“型符”主导的节目内容也决定了其表达方式是概念化的，表达的句式可以概括为“……是什么”，即某民族的某事物或人物活动是什么样的。不仅反映少数民族服饰、饮食、手工艺等事物的内容是概念化的表达，而且民俗风情、节庆祭祀、历史文化等人物活动的内容也是概念化的。即使是反映少数民族精神世界的内容，也是用解说进行概括，而不是主要用叙事去表现。

概念化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在它们的外延中忽略事物的差异，把这些外延中的实体作为同一体去处理它们。少数民族文化节目通常以民族名称、名族事物或者活动为内容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进行过程的再现。这过程虽然看似“叙事的”，但它是在名词和动词为基础设定的概念框架之间进行的，其图像也是按照这个框架概念化地选择视觉符号的制定，这些选择构成了节目的先在结构。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勒文根据图像的特点，将语义关系区分成叙事的和概念的两大类，其中，视觉交际中的概念过程对应于功能语法中的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前者可以表述为“a is an attribute of x”，后者可以简单表述为，“something exists”，或“something happens”。韩礼德认为这两种过程比起叙事的语义关系，表现了更为持久的状态或者更概括的真理。叙事再现展示了发展中的行动和事件以及变化的过程，而概念再现则更为稳定，比如在类别、结构或者意义方面。^{[1] (P2)} 很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正是这样一种概念化的再现，虽然形式上是表达少数民族行动、言语和心理的过程，但是以标签化的、分类的、民族文化承载者意义上的部分出现。

为提升节目的可看性，节目创作应该从概念的表达向叙事的表达倾斜。电视媒体的优势在于讲故事，这也是现在真人秀节目大行其道的原因，如今歌舞类节目，游戏类节目都突出了真人秀元素。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可以更加注重对不同

命运个体的叙事,这种叙事不是做秀,也不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带有结局的不确定性,反映特定文化环境中少数民族人物命运和精神品质的故事。

三、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录式的组篇意义

“语式”指的是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以及语篇的符号组织方式在情境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它影响语篇的衔接风格。文本的“语式”主要分析的是,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录各种模态之间的表意特点、作用和协同组篇关系。参与其中的意义构建模态主要有图像、声音和文字三大类,具体还可分为以下一些小类:

(一) 主体地位的解说模态

解说在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中占主导地位,起主要作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节目的图像离开解说的表述就很难被理解。而如果只是听节目,依然能大概了解所表达的意义,因此节目的主体模态体现为解说,其余是第二性的。解说在少数民族文化节目中多用皮尔斯符号分类中的“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来赋予图像以意义。

“指示符号”能促使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对象之上,与所表达的事物具有指称关系。皮尔斯认为,“使我们吃惊的事物都是指示符”^{[4] (P58)},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的解说在点明节目的新奇异闻内容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刻意地用疑问句或陈述句把受众的注意力引向可能使人好奇甚至吃惊的内容上面。并且,解说使得图像所表达的个体成为其族群特征的指示符,在解说的作用下,某穿着、饮食或活动等就指示了其人群属于某个少数民族。

解说还表达大量“规约符号”,“规约符是由这样一种符号构成,这种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仅仅是(或主要是)因为它被这样使用或被这样理解”,它可以取决于解释者的约定、习惯或生性。^{[4] (P60)}在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中,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特定的规约符,比如铜鼓是白裤瑶虔诚礼拜的神器,或者某种图腾、象征、示范等等,是大家约定好的一种信号,解说起到了点明这些意义的作用。并且,如上一点所说,因为节目主要是概念化的表达,而概念本身也属于规约符,因此整个解说的表达都是规约化的,可以说,节目旨在传递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规约意义,并且试图使这种规约意义更加明确。这也会使得节目的意义表达比较概括简练,尤其是介绍少数民族性格、精神世界和对世界的态度的时候,只用一

些只言片语,如“……族崇拜太阳神”、“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族性格豪爽”等来表达。

因此需要提升解说的深度,播音员作为解说的载体之一,应致力于提升节目的品牌形象,以独特的个性魅力,形成风格化的内容表达,节目编导需要有深厚的人文知识和浓厚的人文情怀,对内容进行深度叙事。

(二) 从属地位的其他模态

图像。电视的最大长处是图像,图像本应很重要,然而在现阶段很多少数民族文化节目中,图像的作用是对解说进行直观反映、印证、补充和强化,因此它只能是次要的一个模态。图像能生动地反映形象,反映服饰、色彩、活动的方式等等。可以说,其主要是通过皮尔斯符号分类中的“质符”和“像似符号”表达一种具体化的“品质”,少数民族人物服饰的柔美或繁富、活动的欢快氛围、活动的具体过程都由像似符号忠实地记录下来。但是,节目也存在视觉概念化的现象,因此在人物性格、情感的展现方面不够丰满立体。并且,图像有一些局限,比如在表现少数民族神话与祭祀方面存在欠缺,神话与祭祀内容包含着神秘的符号、伟大的史诗以及瑰丽的想象空间,可是经图像一表现,就只看见一场普通的农村活动。

同期声。同期声就是同期录音的意思,而不是后期在录音棚里配音来完成。同期声的类别比较丰富,包括记者采访、少数民族人物说话、环境音响等,三者的排序分别代表了它们的主次地位。记者采访处于相对主导地位,整个话题都是出境记者所引导的,少数民族说话通常是简短的回答,因此也不能充分反映人物的性格,这种扁平化的人物形象难以给人心灵的震撼。环境音响更是起陪衬作用,无法吸引人注意。

音乐。音乐在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中出现较少,有时是节目中的配音,有时以片头片尾曲出现。音乐的作用其实较大,好的音乐优美又能抒情,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还能提升少数民族辨识度,但它没有被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广泛的运用。

文字。书面文字在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中运用不多。文字本身在电视媒介中就处于边缘地位,除了字幕以外,其作用不大。

从上述几个模态的特点来看,为了有效实现节目的整体意义,需要充分利用视觉模态的作用,图像在当代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电

视相对于其他媒体的优势也在于图像，所以应多用图像叙事，用画面营造意境，潜移默化传达少数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另外，音乐也是很重要的模态，少数民族精神与特色需要歌的传诵，也可以用音乐营造气氛。

四、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语旨的人际意义

“语旨”是指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和彼此间的关系，以及特定语境中语言使用的真实目的，它体现了人际互动意义。本文研究的“语旨”是少数民族电视节目制作者的意图以及与节目所表征的事物和受众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 制作背景与意图

从影响节目导向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我国少数民族电视节目的制作主体大体分为两个层面：国家与电视媒体。

国家层面。政府作为管理者，一直致力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与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政策是影响节目基调的深层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就发布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工作的文件，从宣传爱国和民族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到突出少数民族特色，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禁止民族歧视和丑化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以及2000年以后要进一步办好少数民族作品评奖活动的要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中宣部、国家民委发布的《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以及三个民族政策白皮书的出台等等都对少数民族文化繁荣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因此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总是反映少数民族积极正面的形象，以宣扬民族文化为话语基调。

媒体层面。电视媒体在网络时代的冲击下遭遇激烈的竞争，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娱乐元素来吸引受众。因此在制作少数民族电视节目的时候，也试图使得内容通俗易懂、轻松愉快，很多节目以趣味、神奇的内容为卖点。并且，采取了一些吸引注意力的表达手法，比如在节目导视或隔断的地方提炼精华、抛出问题并设置悬念，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但是，这导致了节目出现平民化和娱乐化的倾向，而使得人物的神韵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来，停留在对少数民族风俗表象猎奇的层面上，久而久之，落入了一种俗套。当然这

也有客观原因的限制，对于电视台来说，一方面承受着经营的压力，不得不注意节目制作成本，一方面还得克服异域采风的辛苦。而往往少数民族电视栏目采编人员相对少，精力有限，因此导致部分节目内容浮光掠影。对于这个问题，电视媒体应该克服困难，加强民族类电视节目的团队建设，全面、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思想和愿望。

(二) 视角选择与效果

基于上述客观原因，节目在内容的选择上就产生了一定的倾向，比如对少数民族服饰、饮食、节庆等这些表面上的内容拍摄报道得多，而叙述少数民族生存境遇的故事，揭示文化传统变迁下的人际关系，展现其面对当代现实生活的困惑，以及捕捉人性闪光点等人文精神内涵层面，开掘的深度不够。节目的内容更多地展示好玩、好看、好吃等内容，造成了重物质、轻精神的效果，满足观众的低级别需求。

少数民族电视文化节目中“文化”的重点应是“人文”，它既是表现人物、人品，同时又能提升受众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民族文化特色并非奇风异俗，应注重反映民族人物形象、精神情感以及深刻的社会主题，表现社会规则中人物的命运，人物命运的戏剧性发展才是吸引受众注意的法宝。毕竟，少数民族文化节目的宣传功能也是以收视率为前提的。因此叙事应该人性化、细节化，使得节目具有感染力（但不是故意煽情）。总之，少数民族电视节目应该在提供给受众感官享受的同时，传递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 [1] 李战子.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 外语研究, 2003, (5).
- [2] 胡壮麟. 谈多模态小品中的主体模态[J]. 外语教学, 2011, (7): 2.
- [3] 朱永生, 严世清. 系统功能语言学再思考[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20.
- [4] (美) 皮尔斯. 皮尔斯: 论符号[M]. 赵星植,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周真刚)

(责任校对：何 必)